

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



文艺理論學習參考資料

关于文学藝術反映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專輯

主要文件

- 郭沫若：就目前創作中的几个問題答《人民文學》
編者問（摘要）.....(2)

- 邵荃麟：修正主義文艺思想一例（摘要）.....(5)

参考文件

- 以 群：两类矛盾和文学問題.....(13)
王西彥：《鍛煉鍛煉》和反映人民內部矛盾.....(29)
于黑丁：文学要描写矛盾斗争.....(38)
胡青坡：文学作品正确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59)
赵 寻：《站在斗争的前列》.....(68)

就目前創作中的几个問題答《人民 文學》編者問（摘要）

郭沫若

一、（略）

二、（略）

三、关于文学作品如何表現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这在作家和一般文学写作者中，仍感到是不容易解决的問題。您認為文学作品在表現人民內部矛盾时該掌握怎样的原則？表現人民內部矛盾的題材，怎样运用革命的現實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

关于這個問題，我也沒有經驗，恐怕还須得大家从实践中去解决。經驗多了，就能总结出一些原則出来。但在目前，我認為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所揭示的如何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項标准，應該也就是我們創造文学作品的主要原則。我建議我們从事文学工作的同志們把这六項标准作为座右銘，經常放在念头上吧。

- “(1)有利于團結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 (2)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
- (3)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 (4)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 (5)有利于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 (6)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團結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国际團結，而不是有損于这些團結”。

这些自然是政治标准，但文学艺术是服从政治利益的，有了明确的政治标准，文学艺术的創作就有了正确的方針。我們的創作活動首

先就要合乎这些标准。合乎这些标准的就可能产生出香花。不合乎这些标准的就一定产生出毒草。因此，这六项标准不仅是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指路碑，而同时也是产生香花或者毒草的分水岭。

有了这些标准，不是限制了文学活动，而是为文学活动开辟出广阔的天地，并指明了途径。我们根据这些标准，去选择题材，处理题材，题材的范围是无限广阔的。我们再利用艺术的手法来形象化，集中化，夸大化，便有把握地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照着高尔基的话来说，便是加强美的一面，毁灭可惜的一面。

歌颂好的是比较顺手的，事实上作家的想象力和夸大本领在今天有时是落在现实的后面去了。写英雄人物我们不要嫌其夸大，作品写好后，现实的人物可能比作品上的人物更要英雄。但处理坏的东西恐怕就比较费事。这里不仅有立场的问题，还有认识的问题。立场即使正确，认识如果不正确，依然产生不出香花，而有时甚至产生出毒草。总要明确辨别是非善恶，努力助长是的一面，摧毁非的一面，求得矛盾的统一和解决。所以，如果你肯定非的方面，那完全是错误。又如果你把非的不合理的方面强调过分，灰色的成分就会增多，人们也不会欢迎。鲁迅的《阿Q正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今天再强调阿Q那样的人，就会成问题，而且已经不现实了。在那个时候强调阿Q的消极方面并加以夸大，作为我们憎恨的对象，能够发挥很强大的革命作用。在今天就不行。所以我有时想，今后写喜剧是没有问题的，悲剧的写法可是一个大问题。不能说今后就没有悲剧。1956年各项建设事业上的“马鞍形”实际上就是一个悲剧。——不正确的右倾保守思想占了有利地位，暂时把正确的想法、作法压着了，影响了我们的建设。当然，这悲剧后来很快就转为了喜剧。我看写悲剧就必须透示出转为喜剧的气势。负>正是一时性的，正>负是必然的前景。以前有人反对在作品后面“拖一条光明的尾巴”，看来应该是必要的。要根据这样的必然性去写悲剧。历史总是波浪形的发展的。我们的政治领导作用，就是克服错误的倾向，当一般社会上对这个矛盾还辨别得不大清楚时，就能够站在比较高的地方看清楚问题，加以批判，把它扭转过来。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这

两个字不能忽略掉。文学艺术正應該發揮这种作用，表彰这种作用。我們說艺术反映人生还不够，它还要批判人生和改造世界。根据这个观点来处理矛盾，就会强调新生力量和藐视某些貌似强大的落后力量。所以作家必須永远跟着党走，很好地掌握党的方針政策，并尽可能地使自己能够走在时代的前头。

这些話說起来容易，遇到实际問題就不那么简单。譬如毛主席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的問題，还是有些人不能很好的領会，說什么美国看起来是紙老虎，实际上是真老虎。其实主席这个話非常形象化，拿美国來說，它表面上是只老虎，并非一点本領都沒有，但它本質上是只紙老虎。它今天虽然还凶，它是外强中干的。我們且不說資本主义最后一定要走到崩潰的道路上去，就拿建設的速度來說，美国建設的速度就无法跟苏联和中国比。苏联四十一年的建設成就，超过了資本主义国家二、三百年的建設成就，我們的建設速度也非常快。到了一定的阶段，美国这个外强中干的老虎就不敢再耀武揚威，战争也可以归于消灭。

“紙老虎”的問題是屬於敌我矛盾的范畴。人民內部矛盾的分寸也很难掌握。好在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正是六盞强度的探照灯，已經照明着我們好在文学艺术方面进行工作。

总之，要善于掌握矛盾求得矛盾的正确解决。要做到这一点，第一，作家总要有正确的立场和認識；第二，作家要敢想、敢說、敢干。这两者也就是矛盾的統一，一方面要实事求是，一方面要大胆創造。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大胆創造，在大胆創造的风格中实事求是。

任何矛盾都可以写，但必須采取革命的立场，不能把人民內部的問題，写得太灰色，那样就等于泼冷水。人民內部矛盾处理得不好，作家会把自己轉化成敌人。象資产阶级分子过慣了享受生活，所以感觉今天的生活灰溜溜，对这不高兴，对那不满意，犹如杜勒斯看我們一样。杜勒斯說我們的人民公社是把全体人民化为奴隶。周总理說，敌人罵我們就是歌頌我們。的确如此。杜勒斯說我們全国人民都是奴隶，那就是說，沒有主人。六亿五千万人民都是奴隶，也就是六亿五千万人民都是主人。大家都是服务员。为国家服务，为大家服务。这

不就是所謂“公仆”嗎？這有什么不好？這和美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自由劳动者式的“貨銀奴隶”可不一样。這是个立場問題，也是個認識問題。立場不妥當，認識不準確，看得不遠不廣，誤解了矛盾，顛倒了黑白，結果把一個指頭強調得過分，那就会犯錯誤。

在作品中要寫否定性的反面人物，否則，每個人物都是正面的，那是“天官賜福”，那就沒有戲了。有壞的東西才能顯示出好的東西。我看有“花崗岩頭腦”的人也是可以寫的。他們是反面教員，同時也是作品中很好的作料。“要得甜，放點鹽”。“無鹽醋不酸”。“相反相成”。這裏面有个對比的問題。當然，我們不能為寫反派而寫反派，不能过分強調反派的力量，反派力量就是強，也要用“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原則精神來處理它。

（原載《人民文學》1959年第1期）

修正主義文艺思想一例(摘要)

——論《苔花集》及其作者思想

邵荃麟

一(略)

二

在《启示》中，秋耘提出了他对于人生态度和艺术态度的看法，在《肯定生活与批判生活》和《刺在哪里？》等文章中，他更进一步說明这种态度在艺术創作上的实践。

这些文章的主要意思，概括說來，就是說：作家应当去积极干預生活，应当去描写生活中的阴暗面，揭露隐蔽的社会病症和抨击一切畸形的病态的东西，应当为人民“仗义执言”。这样才能达到艺术的真实和美。

秋耘的文章中虽然說得比較簡單，但这正是目前修正主義文艺思想的一个共同观点。提出这种观点，也可以說是为了反对文学上粉飾

現實和无冲突論的傾向，但是他們和无冲突論者一样，自己也陷入到另一个錯誤或者更危险的极端中去了。

文学上粉飾现实和无冲突論的傾向毫无疑问是錯誤的，是应当批判的。这种傾向的錯誤，是在于脱离实际，否認人民內部中間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而認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只有好与更好的区别。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看法。馬克思主義肯定人民內部矛盾的存在，同时指出这种矛盾的性質是非对抗性的，是是非的矛盾。因此党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之一。对于作家和艺术家來說，就是应当如何通过艺术的認識和实践，正确地去理解和反映这些矛盾，借以教育人民不断地去克服这些矛盾。如果对于这些矛盾，采取了錯誤的理解或不正确的态度，那就会产生“左”或右的偏向，也就反映不出真实。所謂艺术的真实应当是以艺术的方法去反映出现实生活中社会矛盾发展的实际情况。这种矛盾表现在具体生活中是十分錯綜复杂的，如果作家沒有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就很难正确地去理解和反映它。例如我国目前的社会生活中，包含着外部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在人民內部矛盾中，又包括着資產階級与工人階級的矛盾和工人階級自身中間进步与落后的矛盾；而在这些矛盾中間，階級矛盾又是主要的。但是修正主义者所看到的矛盾，往往只是工人階級自身中間的某些缺点和落后现象。他們所謂“阴暗面”，实际上就是指这个。而对于資產階級与工人階級的矛盾，以至于資產階級右派对社会主义的进攻，——这些更大的阴暗面，他們却反而熟視无睹，或予以同情，其結果是使自己做了右派最好的助手。为什么他們那样強調描写阴暗面，反而对生活中最大的阴暗面熟視无睹或寄与同情呢？这就是因为他們自己就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场。秋耘在《刺在哪里？》一文中，对于文艺现状的不正确理解和那种夸大其辞不合实际的猛烈抨击，就是这种錯誤的立场的具体表现。

文学艺术既然要求真实地反映现实，因此并不存在所謂应不应该描写生活中落后现象的問題，正如过去討論新英雄人物問題上，并不存在应不应该写人物缺点的問題。問題是在于作家的立场与态度。任何作家对于现实生活总有其所肯定的，也有其所批判的。但这不是一

句籠統的話，而要看作家所反对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在这点上，我們和旧时代的作家是相反的。旧时代作家所反对的现实是黑暗势力占統治地位的现实。他們对于那种剥削的社会制度，首先應該采取根本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批判得愈彻底愈猛烈愈好，而只有在这样一种立场上，才能对人民的力量有真正的肯定。而我們这个时代作家則恰恰相反，首先要对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取积极的肯定的态度，充满着信心肯定它，拥护它，对于它的某些落后现象的批判，也正是为了巩固它。不区别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中作家对于现实的根本态度，那是危险的，正如秋耘用“万井啼寒未有衣”的詩句来感慨当前生活是十分謬誤的。高尔基把旧现实主义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以示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区别，我以为正是为了表明作家对于现实的这种根本态度，决不应引起好象批判现实主义沒有肯定的一面，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沒有批判的一面这种幼稚的誤解。

有人認為“文学总是反抗现实的”，甚而引为“干预生活”口号的根据。这就是抹煞了这种时代区别的显而易見的錯誤。这句话在批判现实主义时代，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运用在我們时代，要求作家用文学来反抗社会主义的现实，岂不变成了反动？以前胡风分子常常剽窃鲁迅的半句話：“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来作为对待新社会的态度，就是同样的例子。鲁迅是說要以这种精神“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去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莫非现在的作家也要以这种精神在我們这个地方来击退我們这个时代么？

秋耘的《肯定生活与批判生活》一文，原題为《不要在人民疾苦前面閉上眼睛》，后来收在《苔花集》中作了刪改。大概連他自己也感到原来文章中对文学的批判生活的任务強調得太絕對了。因此把題目改了，并且补充了一段話：

所謂干预生活，就是既要肯定生活，也要批判生活。肯定于人民有利的东西，批判不利于人民的东西。肯定时要有飽滿的热情，批判时要有坚定的信心和冷靜的头脑。这两者本来是相輔而行的。

但即使作了这样修改，却并没有改变原来文章的基本意思。而就以他所补充的一段話来看，也还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講話》中所批判过的“一半对一半論”的思想。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光明与黑暗一半对一半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在我們这社会生活中，积极的，美好的东西，即人民創造的力量，是占主要地位的东西，是使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的东西。因此，它在我們文学中也是占主要地位的东西。如果看不到这个，也就不可能有什么“飽滿的热情”去肯定和有什么“坚定的信心”和“冷靜的头脑”去批判。我們強調文学上創造新人物的任务，強調描写生活中主流的东西，正是这个理由。自然，这不是說，要把新人物和新生活从现实矛盾中孤立起来描写，而恰是要求从其矛盾斗争过程中去描写。而修正主义者却常常反對我們強調这些任务。他們裝作公允的样子說：现实生活怎样，就怎样描写吧，不要主觀地去強調應該写什么吧。仿佛一強調这些任务，就破坏了艺术的真实性似的。可惜现实并不如他們所想象。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积极的因素正在日益强大地消灭着那些消极的东西。

秋耘在文章中問：“難道說，我們描写了阴暗面，就会伤害了我們所衷心拥护的社会主义制度嗎？”“難道說，我們描写了阴暗面，就会破坏我們艺术作品的美感或高尚情操嗎？”

事实上，并沒有誰不允許作家描写生活的阴暗面。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害怕暴露其自己的缺点的。問題是你所謂阴暗面是什么？如果連右派分子对于我們社会主义生活的誹謗也算作是阴暗面，那怎么不会伤害社会主义的制度呢？就拿秋耘在《錫損了灵魂的悲剧》①一文中推崇备至的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來說，就是一个例子。这篇特寫除了象秋耘所說的，引起他“深沉的叹息，甚至还有点悵惘，有点哀愁”以外，有什么地方足以鼓舞人們的信心呢？而引起秋耘这种“悵惘”和“哀愁”的，又是怎样一种“情操”和“美感”呢？難道說，我們的文学，就是为了給人民以这种“悵惘”和“哀愁”嗎？秋

① 見《苔花集》。

耘又說：“对于一个还未完全丧失热情的人，悵惘和哀愁未尝不是一种鞭策，也可能是自拔与新生的起点。”这是很离奇的說法，和我們沸騰的生活是多么不相称呵。确实，这种“悵惘”和“哀愁”的情調——实际上是对于生活感到空虛的一种情緒，在近两年来的文学中忽然流行起来。它表现在《本报内部消息》中的馬文元身上，也表现在《組織部新来的年青人》中的林震和赵慧文的身上。这些东西被修正主义批评家称赞为“生活的真實”，引导一些青年去追求这种“情调”和“美感”，这难道不是一种思想上的伤害或所謂“灵魂上的锈員”嗎？

秋耘还引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話：“艺术作品里的美，必然从现实地反映生活中得来。美就是生活。”来答复他自己的問題，可是他把車尔尼雪夫斯基下面紧接着的两句话忘了。那两句话是：“我們在那里看到依照我們概念应当如此的，就是美。任何东西凡是独立表现生活或是使人忆起生活的，就是美。”①可見車尔尼雪夫斯基 所謂美，正是那种鼓舞人向上的，健康的积极的东西，而不是引导人消沉、怀疑、悵惘、哀愁的东西。

从这里，我們也可以明白修正主义者所謂“干預生活”口号的实质。尽管秋耘說干預生活也要肯定生活，但从他們的全部理論和实践看，实际上只是片面地强调文学暴露黑暗的任务。所謂“干預生活”，也就是秋耘所謂为人民“仗义执言”，为人民“鸣不平”而已。“干預生活”这口号如果在旧社会中，本来有它积极的意义。因为旧社会中作家不仅是在統治阶级压迫之下，并且也被隔绝在劳动群众之外，他們要干預生活，要以艺术去反抗现实，这是完全應該的。而在这新社会中，作家本来就应该和人民結合在一起，和群众共同从事于建設社会主义的劳动。决不是站是群众之外或之上来横加干預，或所謂“仗义执言”，更不是象胡风所說文艺的任务是“为民請命”。如果是站在那样立场，試問，他仗的是什么义，而他又是向誰去請命呢？这是把作家和群众的关系，放在一种錯誤的位置上，仿佛作者是第三

① 見車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

种人似的。从一些所謂干預生活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的这种立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作品給予讀者的不是信心的鼓舞，而常常是对生活的怀疑、消沉或者所謂悵惘与哀愁等空虚的感觉。

人們也許會問：难道我們生活中沒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痛苦，人民中間沒有这样那样的抱怨和不滿意嗎？那末，作为人民代言人的作家和艺术家，为什么不應該替他們說話呢？为了答复这个問題，我不妨摘引高尔基在《答复知識分子》中的一段話：

你們問：“在工农之中有沒有不滿意的人，引起他們的不滿意的是什麼？”不滿意的人自然是有的。如果13年的工作的結果，就已經使16000万人在一切需要和愿望方面都完完全全的滿足了，那是非常奇特的事情。不滿意的原因，正在于13年的工作，政权机关还不能滿足劳动羣众的迅速生长的文化需要。不够的多得很。也就有不少的人咕噥着，抱怨着。这些抱怨可以說是可笑的，因为这是太早了，太不加考慮了。然而我不說这些抱怨是可笑的，因为这些抱怨里面很肯定的包含着对于政府力量的确信，以为政府能够滿足國內的一切需要。自然不滿意的，甚至于积极反对着苏維埃政权工作的，还有一部分富裕的农民。他們以為革命应当使他們变成大地主，而把貧民交給他們支配，放在他們掌握里面。自然这一部分农民反对集体化，贊成个人經濟，雇佣劳动等等，而这些都不可避免地要引导資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复活。然而这部分农民的把戏已經失敗了，他們的抗拒集体經濟是无希望的，不过由于惰性罢了。

工农羣众中的最积极的队伍是不抱怨的。他們工作着。他們很知道政权是他們自己的；他們所缺少的，所需要的一切，只能靠他們自己的精力去取得滿足。正是这种对自己的能力和权力的認識，引起了那些社会主义竞赛，突击队运动之类的現象，以及其他劳动兴奋，劳动的英勇主义的无可爭論的征象。这种認識力量，使得許多企业的五年計劃，在两年半之内就完成了。①

我們的作家为什么不以高尔基的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去認識我們的生活呢？为什么不从这种对工人阶级的能力和权力的認識中間，从生

① 見《高尔基散文选集》。

活的全部进程的了解中間，去对待生活中的积极和消极的现象呢？为什么要以堂·吉呵德式的“侠义精神”和悲天憫人的态度为某种现象而感到精神的极度不安呢？这絕不是說我們要迴避生活中的某些困难和疾苦，如秋耘所說“閉上眼睛”，“保持緘默”等等，而恰是說明作家只有对劳动人民的能力和权力有正确的認識，对现实生活的全部进程有真正的了解，才能正确地用批評与自我批評精神，去正确地描写出生活中的落后现象，为克服我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而斗争。在这方面，苏联作品中象《毁灭》《被开垦的处女地》《前綫》《鋼鐵是怎样煉成的》等都曾經給我們提供很好的范例。

现实生活的复杂的，尤其是在我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切都在迅速地变化着。作家要認識现实的真实，不是仅仅凭借其直觉的感受，或是凭借小資產阶级多愁善感的空洞热情，而需要投身于火热斗争中，去觀察、体验、分析、研究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生活和一切斗争方式。在我們生活中，也常常有些虚假的现象，例如农村中常常出现的一些人为的粮食紧张状态，和实际情况恰是相反的。作家如果没有正确立场和对于生活的深入理解，则很容易被这些假象所欺骗，在右派进攻的日子里，有些知識分子就被右派分子那些夸大其辞，顛倒黑白的污蔑和誹謗弄得头晕眼花，不正是說明这种情况嗎？

修正主义者似乎很強調真实，以为只有描写阴暗面，才能表现真实。但是同一现实，在不同作家的眼里往往可以看成是两种不同的真实。例如秋耘說：“常常深入生活中去的人，誰都可以看到这样或那样的民間疾苦，好些人有眼泪，并非由于笑得太过份，而是因为困难和不愉快的遭遇在折磨人。”而另外一些更长期在生活中鍛煉着的作家，却常常以一种信心充沛的高昂情緒向我們告訴他們在生活中間看到的和所感受到的令人鼓舞的故事，虽然他們絕不掩飾他們所看到的困难和疾苦的一面。这是由于什么呢？客觀的真实，不仅决定于作家的直接感受，还要依靠作家对于事物的本質的認識，它是通过作家的意識的三棱鏡而反映出来的。如果作家自身存在着一种对现实阴暗心里，那末即使是正常的现象，反映在他的意識三棱鏡上，也会呈现为阴暗的状态。秋耘对于现实生活的那种阴暗的看法和悲天憫人的情

緒，我以为首先即是由于他自己对于现实生活存在着阴暗的心。这种心，是他个人主义世界觀与集体主义的社会生活的矛盾所产生的結果。由于这种矛盾使他感到“一个作家最大的痛苦是在于不能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写下自己心里的話，而在自己想要說的和別人認為應該說的話之間作一种折衷和妥协”①。他所謂“心里的話”又是什么呢？显然就是对于现实的反拨情緒，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見不得人的阴暗心理。这和吳祖光所謂在文艺中看不到“真心話”，恰恰是如出一轍。

修正主义者之所以一再強調我們文学中描写阴暗面是文学反映现实的重要任务，就是这样的原因。他們抹煞了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任务的区别，片面地強調两者的一致性，从而企图取消或修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則。他們和我們的主要分歧，就在这里。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要求作家站在正确的立场，从革命发展中，艺术地去描写生活的真实。它反对粉飾现实，也反对歪曲现实。作家應該具有对人民生活最真切的关心，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心。这不仅需要有正确的世界觀，也需要对于生活的高度热情。我們并不贊成斯宾諾莎那种“不要笑，不要哭，只要理解”的理論，我們要求作家把人民的思想感情化为自己的血肉，使它成为最生动地教育鼓舞人民的艺术。而要这样做，只有切切实实的，在生活和斗争中和劳动群众真正結合。最近党号召全国作家长期地深入基层生活，参加实际斗争和体力劳动，这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的道路。

（原載《文艺报》1959年第1期）

① 見秋耘：《刺在哪里？》《文艺学习》1957年6月号。

两类矛盾和文学問題

以 羣

— 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反映社会的矛盾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經濟的反映，又給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础，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现。”①这是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文化、政治和經濟的关系的最好的說明。

我們如果要問：文学主要任务是什么？那么，首先就應該从这个规律中去找解答。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是文化的一个部分，都是屬於观念形态的范围，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都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客觀世界有一定的发展规律，政治和經濟有一定的发展规律，这些规律都是可以离开作家的主觀而独立存在的，可是，作家单凭自己的主觀却造作不出文学来，他必須根据客觀的世界、根据现实生活所給予他的印象，才能够創造出作品来。这点，即使在幻想的神話中也并不例外，神話中的神仙鬼怪的形象基本上不会超出人和兽的范围，而他們的生活，也往往只是某种条件下的人的生活的再现或夸张，就是这个道理。例如，孙悟空，就是在人和猴子的性格基础上所創造出来的人物，而孙悟空所遭遇的对立面——从妖魔鬼怪以至天兵天将，他們也无不表现着人的特点和慾望（所謂“七情六欲”）。完全和人的生活沒有联系的神的形象在文学艺术中是没有的。

对于广大的閱者群众來說，文学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客觀的社会生活规律的反映，而产生宣传教育的效果，并且因而产生影响现实生活、改造世界的作用。作家反映客觀世界的固有规律愈接近正确、愈接近真实，他的作品所起的教育效果就愈大，对现实生活的改造作用也就愈大。

①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 635頁。

这就是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論的基本規律。

通常，文学作品往往表現着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矛盾事物的相互依賴和相互斗争。所謂文学的主题，往往就是某种矛盾的意义的闡釋。作家們常常說：找不到矛盾就創作不出作品。如果从这方面看來，那么這話是对的。可是，矛盾究竟是否作家找来的呢？那也不是的。矛盾是客觀的存在，有了世界就有了矛盾。正是因为矛盾在现实生活中有着这样的普遍性，所以，它才成为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所不可缺少的主題。作家的創作不可能离开客觀的现实生活而独立存在，客觀的存在中有矛盾，因而，文学就不能不反映矛盾。

在客觀现实之中，“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終的矛盾运动”；“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沒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①

文学所反映和表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方面矛盾的相互依賴或相互斗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包括个人的精神世界）的活动和发展以及它們发展的规律。这一切，也就是矛盾。因而，我們可以說：沒有矛盾就沒有文学。

历来的文学作品——从抒情的到敘事的，总是表现着主人公对某种事物的爱憎去就的感情，表现着不同的人物对于共同事物的不同的思想或态度，表现着不同的人們为着各自的目的而展开的或明或暗的斗争……这一切都是矛盾——不是社会矛盾在各种人物的精神世界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就是思想感情不同的人物为着某些事物而展开的互相依賴或互相斗争。例如，在我們的古典文学中有不少表现爱情，表现英雄、才子或能人爱美女的作品，他們或者由于某些条件的限制而不能赢得美女的欢心，或者由于某些条件的具备而获得了美女的欢心，或者赢得了美女的欢心之后又由于某些条件的限制而遭到某些人（如对方的父母、兄弟或亲属之类）的破坏，或者縱使

① 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771頁。

不能赢得美女的欢心，但由于具备了某些有利的条件（例如財、勢或地位）而达到了目的。在这里，似乎愛情是矛盾中心，可是，矛盾的解决——斗争的胜负又不是决定于当事的男女双方的爱情，而是由各人所依赖或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强弱，作了决定胜负的最后条件。这种社会势力的基础是建筑在哪里呢？那就是建筑在生产資料私有制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筑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在那样的社会基础上，爱情已經不是仅仅作为人們精神世界的一种活动，而是成了物質占有一种表现方式；妇女，往往不能成为表达自己的独立意志的人，而只能成为經濟上的生产資料占有者和政治上的統治者的劫夺物和占有物。一切爱情的悲剧的真正根源就在这里。所以，在这些作品里所表现的矛盾，在形式上是爱情的矛盾，而实质上却是阶级的矛盾，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方式。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之中，有着完全不同的爱情。我們說：爱情是文学的永恆的主題，但并没有永久不变的意义，就是这个道理。

又如，在我們的古典文学中，有的描写英雄豪杰的劫富济貧，有的表现“俠客义士”的“除暴安良”，这在表面看来，似乎都是表现好人和坏人的斗争，善和恶的斗争，而实质上却是表现拥护私有财产制度的人們和反对私有财产制度的人們的斗争，剝削和反剝削的斗争。因而，也就表现了两种作家对待私有财产制度。对待剝削的两种观点、两种思想、两种感情。歌頌英雄豪杰劫富济貧的作者，站在反对不合理的私有财产制度，并抨击維护这种制度的政权的地位上；而贊美“俠客义士”“除暴安良”的作者則站在維护既成的私有财产制度、并支持維护这种制度的政权的地位上。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所以，宋江、武松等有时被写成坚决反抗封建統治的失敗的英雄，有时又被写成逐渐消磨了“盜寇”的野心，終于接受“招安”、为朝庭效命的“悔悟”的“义士”。而黃三太、黃天霸等一向被写成英勇无比侠义可风、反“暴”护“良”的英雄，实质上却是阴险恶毒、自私自利、无情无义的奴隶。因此，这些作品从表面看来，似乎只是描写好和坏、良和暴、勇和懦、智和愚、义和不义的矛盾，实际上却正是以各自的觀点来描写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前，我們的整个社会都是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我們的整部历史都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社会里存在着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对立，少数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者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对立；而且，两个对立的阶级集团不断地在斗争——从思想意識上的斗争到各种規律的武装斗争。因此，过去一切文学作品所反映的都是阶级社会里的矛盾——阶级斗争。有的直接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生活，思想倾向較为鮮明（这就是进步的文学作品）；有的比較間接地反映了阶级斗争，思想倾向比較隐晦；有的作者在思想認識上比較自觉，有的作者在思想認識上不够自觉……但不論他們的倾向是否鮮明，也不論他們主觀上是否自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阶级斗争，这是无疑的。其中，有一些作家也公然說：他的作品不反映阶级斗争，不带政治色彩，它只是“純文学”；然而，事实却往往証明：这些作家正是站在統治阶级方面的阶级斗争的能手，他的所謂“不带政治色彩”、“純文学”，只是欺騙讀者群众的一种手段，企图借此隐瞒他为反动的統治集团宣传的真面目，因为他沒有勇气承认他是被誰所豢养、为誰而服务的。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的阶级社会（不論是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文学作品的基本內容都是反映和表现阶级斗争的生活。尽管有的直接，有的間接，有的鮮明，有的隐晦，有的自觉，有的不的自觉，但都反映了客觀存在的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阶级斗争，这一点却是共同的。而某些作品，作者尽管打着“无目的”或“为艺术而艺术”的招牌，实际上却正是为反动的統治阶级服务的有力武器。所以，我們可以說：过去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过去的文学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記錄。离开阶级斗争就沒有文学。

二 沒有矛盾、就沒有文学

可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国家內，生产資料私有制已經消灭，剥削阶级也将逐渐消灭，國內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結束”，在这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上，在文学工作